

地方保护主义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

陈平¹，方羚¹，李静²

(1.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中山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地方保护主义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理论框架，运用2000-2013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对地方保护主义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地方保护主义与资本配置效率呈显著负相关；(2)东、中、西部的地方保护表现不尽相同，地方保护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负向作用在中西部要显著高于东部。整体上，本文研究为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和宏观调控方面上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可以通过减弱地方保护主义程度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如：使地方政府的权责与财力相适应；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与当地国企的政治关联；建立综合的、长期的考察政府官员业绩的标准；建立透明的市场准入制度。同时，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这类跨区域合作战略，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

关键词：地方保护主义；资本配置效率；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在全球的范围内，各国都在倡导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商品、服务、资本要素都能自由流动，消除贸易壁垒。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在积极推动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我国，地方政府在调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各地相互竞争日益激烈，地方保护主义逐渐造成区域市场分割，市场一体化进程困难重重等负面效果。有一句古语：“兄弟阋墙则难以外御其侮”，在全球范围内都在提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我国在国内和国外表现出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使得国内的地方保护主义该何去何从？地方保护主义是否如当地政府初衷一样，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因此，研究地方保护主义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意义重大。在现实应用中，该类问题的研究有利于处理好地方政府与所在区域市场间的关系，从容应对国际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局面，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然而，目前鲜少从地方保护主义角度出发探究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文献。

现有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文献中，国内侧重于运用Wurgler(2000)模型，以全国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主要集中于探讨市场因素，如金融发展程度、市场信息效率、市场化程度和所有制等对全国范围内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Wurgler, 2000; Beck、Ross Levine, 2000; Almeida、Wolfenzon, 2005; 韩立岩、蔡红艳, 2002; 周中胜、陈汉文, 2008; 周中胜、罗正英, 2011; 李青原、潘雅敏和陈晓, 2010)，而往往忽视了非市场因素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非市场因素研究中，方军雄(2008, 2009)从企业并购的角度说明了地方保护行为导致了我国区域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而市场分割又增加了异地并购的难度，从而损害了资本配置效率；潘越、王光宇、许婷(2015)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由于社会资本对于构建合理的外部环境、促进区域内人际合作，因此较高的社会资本水平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纵观地方保护主义的相关文献，由于其表现形式多样，且具有一定的政策隐秘性，对于其定量的研究较少；在不多的对地方保护定量研究的相关文献中，相关的研究指标有以下几种：(1)从生产领域进行测度(白重恩, 2004; 郑毓盛, 2003; 保建云, 2008)。这些从生产领域测度地方保护

程度虽然简单只管，数据的可得性较好，但是仅从经济结构数据分析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生产领域的差异性不单单是由政策因素造成的。(2)从贸易角度进行测度(Poncet, 2003; 王庆喜、徐维祥, 2014; 黄贇琳, 王敬云, 2006)。但这种度量方法仅考虑商品市场，而对要素市场缺乏考虑，并且贸易还容易受到商品替代效应的影响。(3)从商品价格角度进行测度(陆铭、陈钊、桂琦寒, 2006)。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价格变动包含信息较多，且数据相对齐全便于计量分析，但是缺点在于不能很准确界定出价格的变化幅度是来自于地方保护。(4)通过调查问卷进行测度(李善同, 2004; 樊纲、王小鲁, 2011; 林毅夫、刘培林, 2004; 覃家琦、邵新建, 2015; 余东华, 2008)。调查问卷的方法可以直接获取地方保护的第一手资料和相关数据，更具有说服力；但是由于时效性和操作透明性，它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由此看出，从地方保护主义角度出发探究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较为空白，同时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复杂性和隐秘性，前人的定量研究较为片面。本文试图弥补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缺，通过较为全面的度量地方保护程度，利用实证计量探讨地方保护主义对我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日后的国内外区域合作提供可行的实证支持。

本文的贡献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研究角度上看，现有的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市场因素的影响，而忽视了非市场因素，本文从地方保护主义的角度对中国资本配置效率进行研究，在理论分析上侧重于从产业同构的角度对地方保护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较为新颖的理论框架，这弥补了此类文献的空白，且该方向对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其二，从指标设计上，不同于以往大多数地方保护研究的相关文献侧重于对其进行定性研究或是单方面的定量度量，本文对地方保护主义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比、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国有企业职工占比以及省内贸易占比这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定量分析；其三，从实证角度来看，本文不仅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实证分析，而且对我国的东、中、西部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这样更加贴近我国现实，对政策的指导意义也更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背景

1978年之后我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计划力量逐步削弱，中央向地方开始分权，地方政府的保护行为开始出现。1994年，我国正式实行分税制，但是两级政府财权划分不明确，财政收入多集中于中央政府。同时，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也不明确，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事权，导致地方政府收不抵支，地方政府承担着沉重的财政支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责任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变(图1所示)。加上中央的财政支付转移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各地方政府想法设法通过增加税源和税种增加财政收入，缓解财政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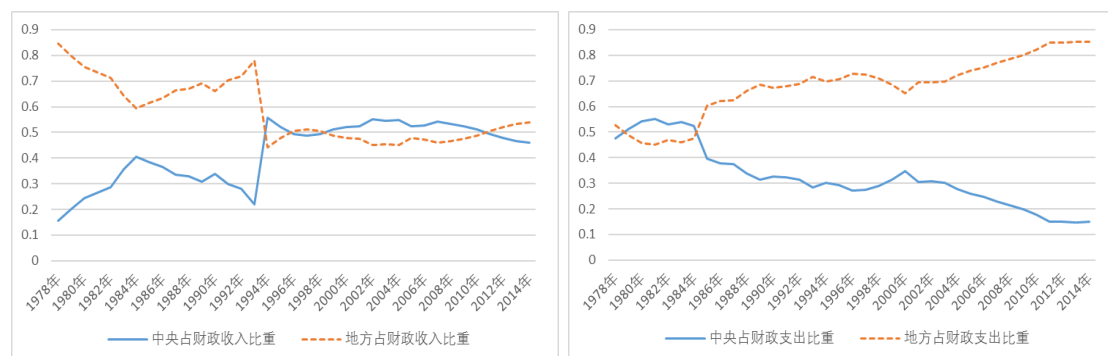


图1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支出比重

此外，中央政府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强化了以政治激励形式的政府竞争程度。有研究

表明，官员的政治晋升是一场博弈，在给定晋升名额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提拔往往会导致另一个人晋升机会的降低。因此，各地间相互比较竞争成为常态，很难心平气和地在一起实现区域合作。同时，政绩评价具有当期性，即仅仅评价某官员在当地任期内的政绩，当某一地方官员调离原来从政的地区，该地方未来的发展状况并不在此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范围内，这样也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本位主义。在这样的政治晋升激励下，各地方政府官员积极地发展本地经济，围绕着 GDP 开展了“经济锦标赛”，并且这是具有本位主义、短期性质的相互竞争。

因此，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使得各地方政府开始为保护当地市场而实行措施，往往会保护地区内利润率高或者税率高的行业和产品。由于各地区在自然禀赋、历史政策导向上的差异性，导致了各地区的产业状况出现了不同的格局。在历史上，我国政府曾将大量的重工业项目布局在中西部，造成了这些地区的产业重型化，产业偏重于第二产业。而我国的东部地区凭借着在资金、技术、人才、交通上的优势，往往偏重于附加值较高的第三产业。2014 年第二产业比重超过 50% 的省份有 15 个，其中 10 个为中西部省份，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45% 的有 8 个省份，其中 6 个位东部省份。因此各区域由于产业布局的不同而可能会使地方保护在产业上的表现有所侧重。

此外，地方保护主义在各地区的程度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经济发达的区域由于自身的条件较好，市场程度化更高，即使仅依托自身也不会对经济发展造成很大的阻碍。相比之下，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竞争力较弱，市场容易被侵占，仅依靠地方自身很难实现经济的发展。

(二) 地方保护主义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从一个较为创新的视角——产业同构的角度，来分析地方保护和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

由于政绩激励，各地区开展为了政绩的相对位次而相互攀比、相互较劲的“GDP 锦标赛”；由于财政激励，各地尽可能地增加税种、税源以增加财政收入。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各地都纷纷进行“大而全”的地区发展战略，相互独立排斥，不根据自身的相对优势发展地区性、合作化、专业化的产业。在“十二五”规划当中，把石油、化工作为主导产业的有 16 个省，把汽车作为主导产业的有 15 个省，把钢铁作为主导产业有 11 个省，还有 28 个城市定位为建成区域的或者国际的金融中心。

$$S_{ij} = \sum_{k=1}^n \frac{[(X_{ik}][X_{jk})]}{\sqrt{\sum_{k=1}^n X_{ik}^2 \sum_{k=1}^n X_{jk}^2}}$$

通过测算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S_{ij} 可以判断出我国产业同构程度高低， S_{ij} 大于 0.5 表示两区域结构趋同度大， S_{ij} 小于 0.5 时趋同度小。从图 2 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产业同构化系数很高，在 0.985 左右，各地产业区分度不强，且大部分省份的产业同构系数在 0.97-0.99 范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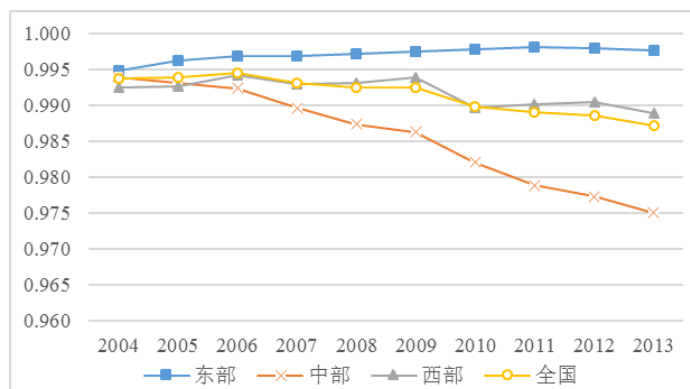


图 2 我国及各区域产业同构程度

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是造成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首先，就本地来看，由于不按自身优势发展，当地产业天生具有弱市场竞争力和低效率，资本一直投入在低效率的行业和部门；其次，就全国范围来看，各地对原材料的流出进行限制同时也对外地商品的流入进行限制，这样难以形成专业化分工，各地区无法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为了维持已形成的产业而衍生出来的地方保护主义固化了已经严重存在的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的现象。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原本在市场竞争中应该被淘汰的产能依旧存在，各地依旧无法进行合理分工，最终导致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现象没能得到消除反而更为加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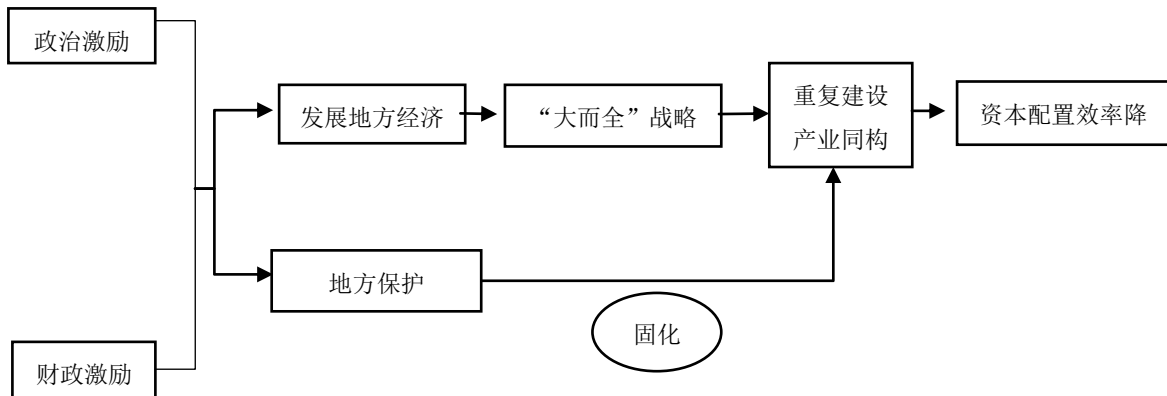


图3 产业同构视角的地方保护与资本配置效率关系

总的说来，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是造成资本配置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而地方保护主义通过固化地区间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而影响了资本配置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地方保护程度越高，资本配置效率越低，即地方保护程度与资本配置效率负相关。

假设 2：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三、研究设计

(一) 模型设计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地方保护主义对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有何影响，因此被解释变量是我国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解释变量是地方保护程度。被解释变量资本配置效率是根据Wurgler（2000）提出的模型而测算出来的（式1）。此外，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同期性偏见问题，因此将解释变量都滞后一期建立计量模型（式2）（李青原，2010；张璟，2013），具体如下：

$$\ln \frac{I_{ic,t}}{I_{ic,t-1}} = \alpha_{c,t} + \eta_{c,t} \ln \frac{V_{ic,t}}{V_{ic,t-1}} + \varepsilon_{ic,t} \quad (1)$$

$$\eta_{c,t} = \alpha + \beta lp_{c,t-1} + \gamma control_{c,t-1} + \varepsilon \quad (2)$$

其中， $\eta_{c,t}$ 为地区c，第t年的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 $lp_{c,t}$ 是地区c，第t-1年的地方保护程度度量指标， $control_{c,t-1}$ 地区c，第t-1年的控制变量指标。

(二) 指标构建

1. 被解释变量

国内外学者在测度资本配置效率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边际产出均衡法和弹性系数法。

边际产出均衡法由于采用的生产方程、推算方法和各类企业数据的不同，会导致推算的结果差异性较大，故本文不采用该方法。而对于弹性分析法，当每个项目之间的边际成本之比都等于价格之比时，即可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弹性系数法的出发点，即 $MC_i/MC_j=P_i/P_j$ ，经简单转化，可得：

$$\frac{P_i - MC_i}{MC_i} = \frac{P_j - MC_j}{MC_j} \quad (3)$$

如果项目 i 的边际收益率大于项目 j ，那么则会增加项目 i 的投资，减少项目 j 的投资。换言之，就是对产值效益处于“上升”的行业增加投资，对产值效益处于“下降”的行业减少投资。按照上述逻辑，同时根据方军雄（2007）、李青原（2010）、等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建立以下模型用以测算资本配置效率：

$$\ln \frac{I_{ic,t}}{I_{ic,t-1}} = \alpha_{c,t} + \eta_{c,t} \ln \frac{V_{ic,t}}{V_{ic,t-1}} + \varepsilon_{ic,t} \quad (4)$$

其中， $I_{ic,t}$ 为地区 c 内行业 i 的第 t 年的固定资产原值， $V_{ic,t}$ 为地区 c 内行业 i 的第 t 年的工业增加值， $\eta_{c,t}$ 为我国各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 $\eta_{c,t}$ 数值越大则表明资本配置对行业新衰的变化越敏感，行业间的资本配置效率越高。 $\alpha_{c,t}$ 为常数项， $\varepsilon_{ic,t}$ 为误差项。

2. 解释变量

直接定量度量地方保护程度的可行性较低，因此本文在设计地方保护衡量指标的时候，主要基于地方保护的成因和表现形式，从地方财政税收、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有企业就业和省际贸易这四个角度出发考察各地的地方保护程度，选取了 4 个具体的代理变量^①。

(1) 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比 (Tax)：在现行的中央地方收入划分中，企业营业税完全纳入地方收入，而纳入共享范围的中央企业所得税地方占有 40%，地方国有企业的所得税则完全收归地方财政。这样，地方企业和高利税率企业就成为了地方财政的重要财源。在我国，当某一地区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在地方财政税收中占比越大，地方政府则越有动机去实施地方保护措施。因此本文将各地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的占比作为衡量地方保护程度的指标之一。

(2)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 (GY)：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是指地方政府经营和使用国有财产取得的收入，该项收入是地方财政非税收收入的一部分。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是地方政府对于当地国企较为直接的保护表现，但是在地方税收科目改革后，国有企业计划亏损补贴不单独立项，直接纳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因此，本文将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地方财政非税收收入比重纳入考察范围。

(3) 国有企业职工占比 (ZG)：由于地方的就业水平是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衡量标准之一。而地方政府官员出于执政能力、私人利益等问题的考虑，特别是出于政治目标或者是对国有经济的内在体制偏好，会在资金调配、项目招标等方面给予地方国企一种特殊的关怀。同时，地方政府官员也能从国有企业获得安排亲戚、任免人事等利益。所以本文将国有单位职工占各地区就业人数比重

^① 本文也很想直接度量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但是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隐秘性、复杂性，直接定量衡量可行性很低，所以本文从地方保护主义的动机和结果两个方面选取了 4 个代理指标进行衡量，前三个指标出于地方保护动机，第四个为地方保护的结果体现。此外，在地方政府采购中采购当地商品的比例也是值得考察的，但是鉴于当地商品采购数据并不公开，所以本文无法考察。

作为衡量地方保护程度的指标。

(4) 省内贸易占比 (HW): 出于对本地市场的保护, 地方政府往往会设置市场壁垒, 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 同时限制本地商品流入外地市场, 这样的贸易壁垒使得商品贸易在省际之间难以自由的流动。因此, 各地区的省际贸易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保护程度的高低。因此, 本文将省内货物交易量占各地区省际货物交易量的比重作为衡量地方保护程度的指标。

综上, 本文采用这 4 个代理指标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衡量。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了以下 6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这些控制变量为可能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的非地方保护程度因素, 具体包括: 固定资产投资 (Inv) 为各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各地 GDP 比重; 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为各地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各地 GDP 比重; 进出口贸易 (Tra) 为各地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各地 GDP 比重; 人力素质 (Edu) 是各地区 6 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地区发展水平 (PG) 是各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 金融发展水平 (FD) 为各地区金融机构信贷额与各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均根据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进行转化, 人均受教育年限由各地区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以相应的教育年限为权重, 比上该地区 6 岁以上总人口数所得的。

研究表明,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越高, 基础设施越完善, 企业生产效率越高, 能使资本得到合理配置; 外商投资比例和进出口总额比率越高, 则地区吸收先进技术, 实现技术和管理能力提升的可能性越高, 从而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相应越高; 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越长, 人力质量越高, 则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相应越高; 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越能有效动员储蓄、加强风险管理等, 能够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李青原等, 2010)

本文各类变量如下表所示:

表 1 本文变量说明

属性	名称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地区资本配置效率	η	地区投资弹性系数
解释变量	地方保护程度	Tax	(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地方财政收入
		GY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地方财政非税收收入
		ZG	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各省就业人数
		HW	省内货物交易量/省际货物交易量
控制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	Inv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地区 GDP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地区 GDP
	进出口贸易	Tra	商品进出口总额/地区 GDP
	人力素质	Edu	6 岁以上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
	地区发展水平	Pg	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
	金融发展程度	Fd	地区金融机构信贷额/地区 GDP

(三) 数据来源及处理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和时效性,选取的时间段为1999年-2013年。其中,固定资产原价和销售收入为该时间段全国30个地区^①25个工业行业^②的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③和《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4);各地区金融机构信贷额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省就业人数和人口受教育情况来源于《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行政区域间货物交流来自于《中国交通年鉴》;各地区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财政收入、国有单位职工人数来源于Wind数据库;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地方财政非税收入来源于CEIC数据库;外商直接利用外资金额、商品进出口总额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各地区各工业行业固定资产原价、工业增加值、销售收入分别用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换算成实际价格(基准年份为1999年)。另外,根据Wurgler(2000)的模型设定,本文剔除了固定资产原价和销售收入的增长率对数绝对值大于1的样本点,最后获得了1999-2013年间11986组地区工业行业样本点,并且分年度分地区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测算出了2000-2013年30各省份共420组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样本,同时利用各地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和年度平滑。

四、实证检验和分析

(一) 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统计性描述

在2007年之前,我国的资本配置效率均处于稍许波动、稳步提高的状态中;自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资本配置效率有明显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三大经济体未见起色、外需市场仍然疲软,而我国政府为了应对这种危局,实施了四万亿计划,这样饮鸩止渴的做法使得工业制造业由于广泛的投资而导致生产边际效益的下降、生产力过剩,原本就存在问题的产业结构、效率低下的企业不仅没有在经济危机中淘汰,反而获得了大量投资,使得整体资本配置效率大大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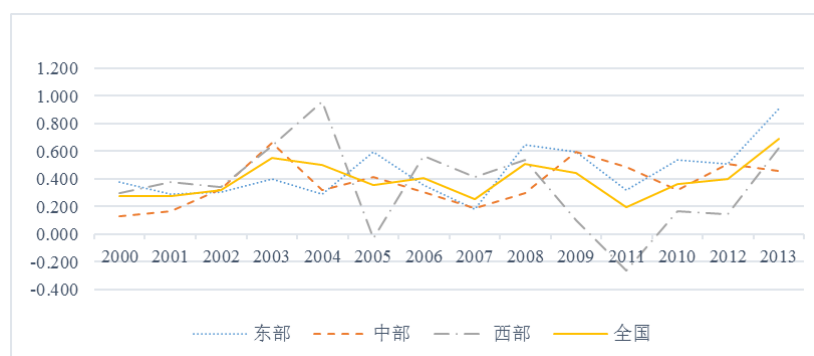


图5 2000-2013 全国及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变动

① 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为:安徽、北京、福建、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海南、河北、河南、黑龙江、湖北、湖南、吉林、江苏、辽宁、内蒙古、宁夏、青海、山东、山西、陕西、上海、四川、天津、新疆、云南、浙江和重庆。因为西藏的数据不全故剔除该省数据。

② 在工业的39个行业中,根据行业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本文从中选取了25个子行业,分别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交通运输设备、金属制品工业、煤炭开采业、农副食品加工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及炼焦、食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通用设备制造、烟草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饮料制造业、有色金属及冶炼、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造纸及纸制品、专用设备制造业。

③ 2008年以后的各地区各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是利用各工业行业每年的同比累计工业增加值增速测算得到。

从地区维度来看,东、中、西部^①在2000-2013年的资本配置均值依次降低,东部为0.450,中部为0.369,而西部为0.349,地区之间的资本配置效率差异较大。这与许开国(2009)、李青原(2010)的实证研究一致。这主要是由于东部存在的资金、人才等要素优势,便捷的交通运输优势以及早期对外开放等政策优势,使得东部资本配置效率较高,此外,作为经济发达的东部,其资本流动性强,而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资本流动性要弱。

但是,从近几年的三个区域的资本配置变化趋势上看,出现了“东慢西快”的局面,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之后,从图5可以看出,自2011年以来,西部的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速度要高于东部,即“东慢西快”态势。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支持这一现象:2006-2012年,东部GDP占比从55.7%下降到51.3,而西部则从17.1%上升到19.8%。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西部地区具备较好的资源条件,能够很好地发挥后发优势,加上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主要地区,此外国家政策,如“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也助力西部发展;另一方面,东部省份的发展受到资源、环境、人口等因素的约束,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东部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增速低于西部。此外,从上图中也可以看出,西部的变化幅度都明显大于东部,这主要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结构不均衡,产业单一,抗风险能力不强,而东部省份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行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产业抗风险能力较强。

(二) 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

(1) 从全国的角度

从表2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直接利用额、进出口贸易额、人力资本程度、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以及金融发展程度等变量后,地方保护程度衡量指标: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比、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国有企业职工占比以及省内贸易占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从而表明,地方保护对于资本配置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地方保护主义程度越高,则全国的资本配置效率越低。该结论有利的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

从地方保护主义衡量的四个角度可以看出,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比、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国有企业职工占比以及省内贸易占比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97、-1.229、-2.367和-0.601。就全国范围而言,出于解决当地就业、保护当地税源和增加地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而产生的地方保护对于资本配置效率的负面影响都较大。这也间接证实了保护税源、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和提升政绩是地方保护出现的主要原因。

从这四个角度上看,资本配置效率受到负面影响主要是由于:(1)当某一地区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地方财政比重增大时,地方政府更有动力去保护当地企业,往往将社会上的资源和资金投向这些企业,由于缺乏竞争性,这些企业并不能有效利用资源,造成资本配置效率降低。(2)当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地方的非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增加时,地方政府越会保护当地的国有资本。该非税收科目中包含着地方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的计划亏损补贴,当地政府通过政策性的补贴等政策方式,向国企转移资本、导入资源;国企作为“稳定的饭碗”,长期受到冗员、低效的诟病,国企员工安于现状,经营效率底下,当地方的国企就业人数较多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其规模的庞大,国企与地方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政府官员容易利用自身的权利安排亲属就业。有数据证明国有性质的企业经营状况并不理想:2015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的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和利润总额分别下降6.8%和29.3%,主营业务利润率仅为4.51%,而规模大致相当于国有企业3倍的股份制企业上述的3个指标分别比国有企业高9.5个、24.1个和0.43个百分点,外商和私营企业比股份制企业

^① 具体的东、中、西的划分:东部: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广东、浙江、辽宁、福建、山东、江苏、广西、海南,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共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为西藏的数据不全,故而剔除西藏。

业还要好。这样，将当地的要素集中在低效的国有机构，自然会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3) 省内贸易占省际贸易的比重上升，反映出当地更偏好与本地区内的交易往来，省际贸易壁垒较为严重，这样容易使得各类商品、服务、资金不能得到优化配置，区域的专业化也难以形成，资本的配置效率受到损失。但是，省际贸易主要是地方政府常常会限制外地商品的进入，而当地的商品流出的受限程度较小，所以虽有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

从控制变量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力素质以及金融发展程度也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提高有利于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有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能够增加劳动力的素质从而也能够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对于地区信贷额占 GDP 比重代表的金融发展程度(F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是由于金融发达地区对于资本的渴求相比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对资本的渴求更不容易得到满足（赵志耕，吕冰洋，2006）。其他控制变量：外商投资直接利用额、进出口贸易额以及经济发展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会在长期起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李青原，2010）。

表 2 全国回归结果

	(1)	(2)	(3)	(4)
Cons	-1.123** (-2.29)	-1.663*** (-3.00)	-2.614*** (-3.47)	-1.346** (-2.41)
Tax	-1.970*** (-2.89)			
GY		-1.229* (-1.72)		
ZG			-2.367** (-2.26)	
HW				-0.601** (-2.17)
Inv	1.625*** (3.38)	1.943*** (3.53)	1.860*** (3.30)	1.585*** (2.95)
Fdi	-0.713 (-0.42)	-1.808 (-0.67)	-2.519 (-0.94)	-0.711 (-0.28)
Tra	0.191 (0.80)	0.073 (0.34)	-0.047 (-0.24)	-0.024 (-0.11)
Edu	0.160** (2.23)	0.209** (2.43)	0.293*** (3.41)	0.180** (2.39)

	(1)	(2)	(3)	(4)
Pg	0.012 (0.06)	-0.075 (-0.33)	-0.019 (-0.08)	-0.048 (-0.22)
Fd	-0.065 (-0.48)	-0.377** (-2.32)	-0.178 (-1.38)	-0.255* (-1.95)
Year effect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	390	390	390	390
Overall R ²	0.171	0.165	0.165	0.164
Hausman 检验 P 值	1.000	0.999	0.999	0.999
Wald 值	141.86***	168.67***	108.19***	108.46***

注：表中***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Hausman 检验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5%。

(2) 分区域的差异性

从东、中、西部的区域划分来看，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的影响具有区域性，且在中西部由于地方保护而导致的资本配置效率损失大于东部地区。这证实了本文的假设 2。此外，各地区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也不尽相同。

尽管在中西部，不是所有的地方保护程度指标都显著，但是就显著的指标来看，中西部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从省际贸易角度衡量的地方保护程度在东部的回归系数为-0.65，而在中部为-6.113；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角度衡量的地方保护在东部的回归系数为-2.06，而在西部为-5.157。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区域性差别主要是由于东部作为经济发达地区，其资本来源广泛，企业管理水平、技术能力都较高，产业结构较为合理；而中西部生产技术较为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人力素质不高，往往依托自身资源。若地方保护程度较高，则会影响其他省份资金、人力的输入，无法提高落后的效率，从而对当地的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更大。

相对于中西部只有很少的地方保护指标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四个地方保护程度的衡量指标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负向影响在 10%的水平下都显著，这可能是由于相较于中西省份，东部省份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为保护各自省区的经济发展，导致其在财政、职工和省际贸易上都有较为强烈的地方保护现象出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生产总值在东部也是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中部，从省际贸易角度出发的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最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中部地区作为承接东部和西部的中间地带，其交通枢纽的作用不可小觑，若只顾省内贸易，并不利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在西部，很多企业都是由政府政策扶持的，这使得由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比所表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显著，此外，人均受教育年限对当地的资本配置效率有正向的影响，这反映了高素质人才对于西部发展的重要性。

表 3

分地区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Cons	-0.463	-3.615	-1.918**	-1.177	-5.402	2.865	-3.203	-4.603	-1.111	-2.022	-2.300	-1.283
	(-0.58)	(-1.51)	(-2.22)	(-1.47)	(-1.18)	(0.52)	(-1.27)	(-1.07)	(-0.85)	(-1.55)	(-1.57)	(-0.78)
Tax	-2.060*				-0.410				-5.157**			
	(-1.78)				(-0.27)				(-2.19)			
GY		-1.599**				1.314				-0.094		
		(-2.64)				(0.55)				(-0.08)		
ZG			-2.134*				-1.978				-1.871	
			(-1.88)				(-1.24)				(-1.10)	
HW				-0.650***				-6.113*				-2.698
				(-3.17)				(-1.82)				(-1.35)
Inv	0.459	2.230**	0.630	0.683	1.808	2.570	1.100	2.170	2.005	2.055	2.185	2.045
	(0.67)	(2.82)	(0.86)	(0.88)	(1.19)	(1.05)	(0.99)	(1.40)	(0.94)	(0.89)	(0.96)	(0.87)
Fdi	2.123	6.417	2.022	2.359	2.680	-16.560	2.880	0.857	3.450	3.130	1.110	0.415
	(0.84)	(1.48)	(0.79)	(0.91)	(0.12)	(-0.50)	(0.50)	(0.04)	(0.42)	(0.26)	(0.10)	(0.04)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Tra	0.192 (0.74)	-0.159 (-0.45)	0.090 (0.36)	-0.026 (-0.10)	-3.673 (-1.73)	-3.372 (-0.59)	-3.005*** (-3.19)	-3.815 (-1.84)	-1.644* (-1.87)	-1.030 (-0.89)	-0.407 (-0.30)	-0.915 (-0.79)
Edu	0.194 (1.62)	0.592 (1.44)	0.376** (2.30)	0.234* (1.81)	0.858 (1.45)	-0.346 (-0.46)	0.598 (1.63)	0.875 (1.49)	0.420*** (2.71)	0.346** (2.37)	0.422** (2.33)	0.360** (2.14)
Pg	-0.197 (-0.97)	-0.855* (-1.90)	-0.334 (-1.45)	-0.202 (-1.00)	-0.515 (-1.08)	-0.190 (-0.15)	-0.266 (-0.64)	-0.592 (-1.27)	-0.618 (-1.37)	-0.582 (-1.24)	-0.677 (-1.38)	-0.595 (-1.25)
Fd	0.135 (0.52)	0.345 (0.53)	-0.113 (-0.41)	-0.114 (-0.49)	-0.181 (-0.25)	0.262 (0.33)	-0.506* (-1.83)	0.085 (0.11)	0.539 (0.72)	0.132 (0.15)	0.149 (0.19)	-0.047 (-0.06)
观测值数	156	156	156	156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Hausman 检验	0.132	0.017	0.985	0.007	0.929	0.985	0.844	0.947	0.999	0.965	0.980	0.967
模型	RE	FE	RE	FE	RE	RE	RE	RE	RE	RE	RE	RE

注：表中***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Hausman 检验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5%。RE 为 Random Effect Model，随机效应模型；FE 为 Fixed Effect Model，固定效应模型。

(三) 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各省各工业行业的销售收入代替工业增加值测算2000-2013年的资本配置效率,然后再进行地方保护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回归研究。

表4 有关工业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

	Ln(工业增加值 _t /工业增加值 _{t-1})	Ln(销售收入 _t /销售收入 _{t-1})
Ln(工业增加值 _t /工业增加值 _{t-1})	1.000	
Ln(销售收入 _t /销售收入 _{t-1})	0.468***	1.000

根据表5的回归结果,从全国范围上看,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比、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国有企业职工占比以及省内贸易占比这四项地方保护主义程度的代理指标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下对资本配置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从东、中、西部区域上看(表6),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中西部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程度要大于东部。此外,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也是提高中西部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这些结论都和本文的主结论一致,说明了本文的结论比较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全国回归结果

	(1)	(2)	(3)	(4)
Cons	4.056** (2.27)	4.638** (2.53)	4.581** (2.53)	4.556** (2.52)
Tax	-1.301** (-2.11)			
GY		-0.374* (-1.88)		
ZG			-2.592*** (-4.05)	
HW				-0.843*** (-6.89)
Inv	0.421 (0.95)	0.586 (1.32)	0.513 (1.28)	0.562 (1.33)
Fdi	6.117*** (3.50)	5.711*** (3.16)	6.099*** (3.49)	5.294*** (3.03)
Tra	-0.465 (-1.66)	-0.399 (-1.45)	-0.452* (-1.96)	-0.326 (-1.17)

	(1)	(2)	(3)	(4)
Edu	0.249*	0.269*	0.310**	0.259*
	(1.76)	(1.87)	(2.09)	(1.82)
Pg	-0.602*	-0.597*	-0.432	-0.573*
	(-1.83)	(-1.88)	(-1.40)	(-1.82)
Fd	0.130	0.094	0.177	0.140
	(0.96)	(0.72)	(1.50)	(1.13)
Year effect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数	390	390	390	390
Overall R ²	0.107	0.101	0.108	0.117
Hausman 检验	0.041	0.006	0.000	0.003
F 值	8.126***	7.811***	9.134***	11.717***

注：表中***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Hausman 检验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5%。

表 6

稳健性检验-分地区回归结果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Cons	0.879** (1.97)	2.000* (1.88)	0.498 (1.08)	1.002** (2.09)	-0.158 (-0.25)	-0.604* (-1.54)	-0.676 (-1.37)	-0.755 (-0.74)	-0.143 (-0.36)	-0.204 (-0.58)	1.888 (1.66)	0.386 (0.93)
Tax	-0.283 (-0.73)				-1.227* (-1.42)				-0.569 (-0.57)			
GY		-0.670** (-2.28)				-1.014*** (-3.11)				-1.083* (-1.80)		
ZG			-1.352* (-1.73)				0.105 (0.14)				-4.360*** (-4.85)	
HW				-0.561*** (-2.95)				0.057 (0.09)				-1.739* (-1.93)
Inv	-0.163 (-0.30)	-0.361 (-0.47)	-0.108 (-0.22)	-0.053 (-0.11)	0.492 (1.22)	0.371* (1.66)	0.385 (1.17)	0.377 (1.21)	0.944* (1.66)	0.816* (1.67)	0.524 (0.73)	0.878* (1.67)
Fdi	2.631*** (2.71)	8.041*** (3.50)	3.307*** (2.68)	3.791*** (3.39)	1.342 (0.55)	1.182 (0.56)	1.452 (0.59)	1.349 (0.60)	-1.561 (-0.49)	-4.485 (-1.16)	8.782** (2.47)	-3.543 (-0.82)

	东部				中部				西部			
	(1)	(2)	(3)	(4)	(1)	(2)	(3)	(4)	(1)	(2)	(3)	(4)
Tra	0.010 (0.05)	-0.323 (-1.29)	-0.016 (-0.08)	-0.119 (-0.53)	-0.373 (-0.42)	-0.197 (-0.27)	-0.324 (-0.35)	-0.362 (-0.26)	0.069 (0.10)	0.154 (0.24)	-1.533** (-2.37)	0.098 (0.18)
Edu	-0.057 (-0.84)	-0.299 (-1.59)	0.016 (0.18)	-0.077 (-0.87)	0.144* (1.60)	0.175** (2.43)	0.167** (2.11)	0.178 (1.25)	0.199*** (3.07)	0.153*** (2.67)	-0.174 (-0.94)	0.187*** (2.99)
Pg	-0.001 (-0.01)	0.313 (1.04)	-0.093 (-0.58)	-0.013 (-0.08)	-0.113 (-0.80)	-0.089 (-0.95)	-0.108 (-0.97)	-0.111 (-0.81)	-0.413** (-1.97)	-0.364** (-2.13)	-0.123 (-0.57)	-0.393** (-2.29)
Fd	0.183 (1.49)	0.171 (0.80)	0.215 (1.64)	0.234* (1.74)	0.050 (0.44)	-0.091 (-0.72)	0.005 (0.04)	0.016 (0.12)	-0.007 (-0.03)	0.057 (0.24)	0.478 (1.26)	-0.213 (-0.95)
观测值数	156	156	156	156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117
Hausman 检验	0.000	0.413	0.196	0.244	0.937	0.937	0.805	0.929	0.080	0.129	0.001	0.059
模型	FE	RE	RE	RE	RE	RE	RE	RE	RE	RE	FE	RE

注：表中***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0%的水平上显著。Hausman 检验设定显著性水平为 5%。RE 为 Random Effect Model，随机效应模型；FE 为 Fixed Effect Model，固定效应模型。

五、总结与建议

本文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制度背景和演变以及区域特点进行说明,接着从产业同构、重复建设这个创新的角度出发,建立了地方保护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理论框架。在充分了解了地方保护和资本配置效率的相关背景和理论基础后,本文对地方保护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这一问题展开了实证设计。本文借鉴了Wurgler(2000)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同时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占比、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占比、国有企业职工占比和省内贸易占比这四个角度构建地方保护主义的代理变量。实证结果表明,地方保护主义确实对资本配置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区域差异:地方保护对资本配置效率的负向作用在中西部要显著高于东部。

从本文的实证结果出发,笔者认为,如若要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缓解地方保护主义:(1)采取措施使得地方政府权责和财力相匹配。(2)减少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3)综合考察地方政府官员的业绩。(4)统一市场准入条件。

特别地,在地方财政税收方面,现行的税收制度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共享税收比例过低,二是地方税收缺少主体税种。地方税收除营业税以外,基本上都是分散的小税种,无法构成地方的主体税种,即使是营业税,现在也面临着增值税扩围的冲击。在地方政府事权和财力不相配的环境下,地方政府未被赋予一定的征税权,消费税收入全额上缴中央,制约了地方征管的成效。同时,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在生产或进口环节征收消费税,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地方政府为增加税源而采取措施保护当地产能。因此,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相应地要进行税收制度改革,其中消费税未来可改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同时,将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这样能够缓解地方税基过度竞争的问题,降低地方保护主义的动机。

针对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性,即中西部地方保护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的情况,本文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1)加大对中西部的支持力度,改变自身原有较为封闭的文化观念,以更加开放的状态消减因为地域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分割状态。(2)扩大区域开发合作。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等涉及范围较大的跨区域合作的战略。

参考文献:

- [1]恩,杜颖娟,陶志刚,全月婷.地方保护主义及产业地区集中度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趋势[J].经济研究,2004,04:29-40.
- [2]保建云.区域发展差距、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一体化发展——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转型大国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8,08:106-112.
- [3]樊纲,王小鲁,牛恒鹏.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2011 年报告.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
- [4]方军雄.市场分割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来自企业并购的证据[J].财经研究,2009,09:36-47.
- [5]方军雄.所有制、市场化进程与资本配置效率[J].管理世界,2007,11:27-35.
- [6]方军雄.政府干预、所有权性质与企业并购[J].管理世界,2008,09:118-123-148-188.

- [7]桂琦寒,陈敏,陆铭,陈钊.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6,02:20-30.
- [8]韩立岩,蔡红艳.我国资本配置效率及其与金融市场关系评价研究[J].管理世界,2002,01:65-70.
- [9]黄贇琳,王敬云.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来自中国的经验数据[J].中国工业经济,2006,02:60-67.
- [10]李青原,潘雅敏,陈晓.国有经济比重与我国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来自省级工业行业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家,2010(1):38-48.
- [11]李善同,侯永志,刘云中,陈波.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经济研究,2004,11:78-84.
- [12]林毅夫,刘培林.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从发展战略的角度考察. No.C2004015, 2004
- [13]覃家琦,邵新建.交叉上市、政府干预与资本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15,06:117-130.
- [14]王庆喜,徐维祥.多维距离下中国省际贸易空间面板互动模型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03:31-43.
- [15]许开国.资本配置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02:34-39.
- [16]余东华,于华阳.反行政性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研究新进展——“转轨经济中的反行政性垄断与促进竞争政策”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J].中国工业经济,2008,02:141-148
- [17]郑毓盛,李崇高.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J].中国社会科学,2003,01:64-72-205.
- [18]赵志耘,吕冰洋.财政支出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时滞分析[J].财贸经济,2006(10):29-33.
- [19]周中胜,陈汉文.会计信息透明度与资源配置效率[J].会计研究,2008,12:56-62+94.
- [20]周中胜,罗正英.财政分权、政府层级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地区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财经研究,2011,11:4-15.
- [21]张璟,陈继明,刘晓辉.区域间信贷资金流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投资研究,2013(6):63-76
- [22]Almeida H, Wolfenzon D. The effect of external finance on the equilibrium allocation of capita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75(1):133-164.
- [23]Beck T H L, Ross Levine, Norman Loayza. Finance and Sources of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 58.
- [24]Jeffery Wurgler,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Allocation of Capital”[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58:187-214
- [25]Poncet S. A Fragmented China: Measure and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Domestic Market Disintegration[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5, 13(3):409-430.
- [26]Poncet S. Measuring Chines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3, 14(1):1-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

CHEN Ping¹, FANG Ling¹, LI Jing²

(1.Lingnan College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2.Center for Marine Economics Research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dong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 Based on the capital allocation model designed by the Wurgler (2000),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13. Then use the result to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by some empirical studies. The results were that local protectionism surely has bad effect on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and different areas has its own degree of influence. This mean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match its capability to its responsibility, and marketiz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reform should be carried on as soon as possible. At the same time, the equally atmosphere should be built around the market. Also,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performance should be built.

Key words: Local protectionism;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Regional Disparity

收稿日期: 2016-07-15

基金项目: 本研究感谢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1JZD02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3278)、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粤军”2014 重点项目(WT1404)、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6A070706004)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6wkpy12)。

作者简介: 陈平, 金融学博士, 教授,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方玲, 金融硕士,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李静, 金融学博士, 副研究员, 中山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